

柳宗元是唐代一位出身统治阶层的官僚文人，生活在专制政体之
年，他身为流囚却以极其坚定的意志，潜心于国家政治、社会所
硕的理论成果；他发挥杰出文才，进行文学创作，写出流传千古
凭借自己不懈的努力，实现了人格的一大转变，由一个政治斗争

柳宗元

思想新探

LIUZONGYUAN SIXIANG XINTAN

● 骆正军 著

下。当时唐王朝社会正在急剧走下坡路，国是日非，矛盾丛生。他
结果受到保守势力的严酷打击，被流放到荒僻的永州。在永州的十
史、自然哲学等多个领域的研究，取得一丰
的优美诗文。在极其艰难困顿的条件下，他
中的牺牲者拼搏而成为一个文化伟人。



柳宗元思想新探

骆正军 著

湖南大学出版社

2007年·长沙

内 容 简 介

本书对柳宗元思想建构的本原,以及他的德治思想、易学思想、佛学思想、文学思想、医药学思想与民本思想等方面,进行了全景式的开掘与探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柳宗元思想新探/骆正军著.

—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7.4

ISBN 978-7-81113-165-9

I. 柳... II. 骆... III. 柳宗元(773~819)—思想评论

IV. B241.9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040605号

柳宗元思想新探

Liuzongyuan Sixiang Xintan

作 者: 骆正军 著

责任编辑: 邹 彬

封面设计: 吴颖辉

出版发行: 湖南大学出版社

社 址: 湖南·长沙·岳麓山 邮 编: 410082

电 话: 0731-8821691 (发行部), 8821173 (编辑室), 8821006 (出版部)

传 真: 0731-8649312 (发行部), 8822264 (总编室)

电子邮箱: presszoub@hnu.cn

网 址: <http://press.hnu.cn>

印 装: 长沙瑞和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80×1230 32开 印张: 7.5

字数: 195千

版次: 2007年4月第1版 印次: 2007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册

书号: ISBN 978-7-81113-165-9/B·39

定价: 16.00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湖南大学版图书凡有印装差错, 请与发行部联系

序

王田葵

柳宗元是从专制王权中心的蓄养之臣被贬谪为“边缘”的“守望”蓄臣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柳宗元的“身份”应该是一个“政治家”。质言之，他首先是一个深谙专制王权政治“游戏规则”的政治家，然后才是思想家和文学家。

一

作为一个“官员”，柳宗元做过礼部员外郎，成为中唐王朝政治核心的一员干将，病弱皇帝宫廷内的一个“马前卒”；作为一个“文学家”，他是李唐王朝韩柳“古文运动”的领军人物。当“政治”与“文学”还能兼容的时候，柳宗元还感觉不到角色分裂的内心痛苦，也就不在意于文章之操持；当“政治”与“文学”分裂之际，柳宗元在忧惧之余才真正感到了痛苦，才觉得需要用“文章”来表达这种痛苦和思想。这种表达过程，是一个求师问道的过程。他一生最重要的“老师”，一是孔子，二是屈原。前者使他通“仁义忠信”之道，后者成了他精神上的知音，使他忠心耿耿于皇上，坚定了“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意志。

一句话，柳宗元一生从事的是“蓄臣”的政治“言说”，保持的是忠诚不贰的蓄臣心态。柳宗元的生命是一种政治生命，他

从未与这个政治的“场”分离过；但从实践、理性层面看，他却成功地实现了精神的超越。

“人的全部尊严在于思想。”（帕斯卡尔语）往根里说，作为中唐王朝蓄臣的柳宗元能生产积极进取的思想吗？换言之，一个失去了尊严的蓄臣能有自觉的忧患与乐感意识并将二者融合起来吗？请读一读骆正军先生的新著《柳宗元思想新探》吧，你就会得出肯定的结论。

书中涉及的“政治与生命”是并列关系的两个概念。就“政治”而言，讲的是皇帝通过科举考试选拔出来的“学而优则仕”的仕人政治，或叫蓄臣政治。在专制王权政治体制下，蓄臣之政见与皇帝政见几乎不可能有（或极少有）良性互动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蓄臣“在朝”时，从事的是遵命政治，“在野”时从事的是单相思式的“献策”、“牢骚”政治。柳宗元自己多次说过在长安时不在意于文章（涉政文章）之操持，操持政论文章是被贬在野之后所为。这不正是说明，（除在任柳州刺史期间外）柳宗元的蓄臣政治是典型的“单相思式”的政治吗？

就生命哲学而言，作为唐代高级仕者（高智商的知识分子），他不同于一般的蓄臣，具有十分强烈的忧乐圆融的生命意志。这种意志使他在自主的精神世界里往往不用“瞧着皇帝的脸色”，而是纵横于诸子百家，涉猎道、儒、佛诸家，“搜择融液，与道大适，咸伸其所长，而黜其奇邪，要之与孔子同道，皆有以会其趣。”加之，在被贬永州之后，他在放情山水中亲眼看到了“生人”之苦难，看到了官吏的残暴与昏庸，亲身感受到“乱政”的端倪和后果。在此种种觉识中，他才坚定地提出“利安元元”的治国之本；才在《辩侵伐论》中看到春秋列国纷争必然引发战国之乱政，提醒为官者注意：“故世日乱，一变而至战国，而生人耗矣”；才在当时的时局中发现弊政之后果，指出“弊政之大，莫若贿赂行而征赋乱”，即弊政再往下滑就是乱政……

因此，在柳宗元的思想与生命哲学里，忧与乐二者能够形成

良性互动，二者的融合既是一种需要，也是一种可能。

骆正军先生在柳宗元的“政治”与“生命”二者之间发现了良性互动的内在逻辑理据，并称它为“一分为三”。即在政治哲学中，存在一个仁政与乱政的两极，但同时又存在一个既非仁政亦非乱政的“中道”之政。仁政是圣人之政，它是柳宗元的理想；乱政是历史事实，毕竟在柳宗元的时代还未出现。柳宗元操持的是“中道”之政，一种“民利民自利”之政。这，恰恰是骆正军先生所要特别论述的重心。

同样，在生命哲学中，也存在“一分为三”的状态，既存在“忧患意识”与“乐感意识”的两极，同时又存在一个既非忧亦非乐、即忧即乐、是忧是乐的“中间存在物”——“自我”。在这个“自我”审美的精神世界里，柳宗元超越了恐怖，在孤独中创造了兼具哲理与诗意的意象群，表现出对历史宿命的坚强抵抗，这是柳宗元悲剧的崇高美。正因为如此，笔者曾专门著文指出：“柳宗元在文学创作上表现出的精神症候是一种审美的生命形态。”^①柳宗元精神世界的“自我”是在一个不可视见，却时时觉识的，在强大政治“他者”压迫中的“自我”。他用文章来言说“自我”忧乐相融的生命意志，一种在当时轶众的生命意志。这是柳文的生命轴心，也许这就是柳学生命哲学被本书作者关注的缘由吧。

王阳明有言：“天地万物与人心原是一本，其发窍之最精处是人心一点灵明。”西方哲人海德格尔也有与之相通的说法，认为人的认识像从黑暗走向光明，黑暗就是遮蔽，只有不断“去蔽”，才能走向澄明之境。柳宗元政治生命世界中既有审美的乐感生命意识，又有孤独悲悯的忧患生命意识，两者伴随着他的全部生命历程。在这风马牛不相及的两极里，柳宗元是如何实现了

^① 何红斌、王田葵，《瞧着皇帝的脸色：柳宗元的精神症候》，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5（9）

忧患意识与乐感意识二者的圆融，从而实现了精神超越的呢？

《柳宗元思想新探》是对作为政治家和思想家的柳宗元精神现象的哲学透视，是近几年来柳学研究的一项新成果，对于扭转以往的习惯性思维定势具有重要意义。作者抓住柳宗元政治生命哲学来解读柳子思想与精神现象，就抓住了柳学的鹄的。许多过去争论不休、人云亦云、理不清的乱麻似乎豁然开朗起来了。论著整体内容的安排结构合理，局部阐释时出精锐之见。笔者愈读愈感到求得新知的欣喜，也就愈感到写此文的必要了。

一

中国人文精神的标志性特征是“忧乐圆融”。这个精神是我们民族受到称道和景仰的集体无意识，“它代表着这个集体并培育着这个集体。”^①这个人文精神作为文化传统，铸就了我们民族的基本性格；它在各个不同时代有其不同的变异，呈现为不同的时代精神。柳宗元的生命素质里也具有这样一种精神，只不过，他呈现的是一种强烈主体性“自我”意识为“中间存在物”的生命意识。换言之，柳宗元与唐代其他思想家不同的是，他以这种“自我”觉知为“中间存在物”成功地实现了“忧乐圆融”。

“忧患意识”据说是徐复观先生于1962年在《中国人性论史》中提出来的。翌年，牟宗三先生在《中国哲学的特质》讲演中曾予阐释，20世纪90年代庞朴先生作专论，遂成体系，而为海内外学者所共鸣。“忧患”一词最早出自《易传》。《易·系辞下》载：“易之兴也，其为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可见，居安思危是忧患的本义。这是某种欲以己力突破艰难而尚未突破的忧患，反映的是一种主体性的坚强意志和奋发精神，它能引起人自身的发现和觉悟，也能引起人自身的把

^① 《庞朴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版，第82页

握和创造。

“忧患意识”是一种理想主义。只有理想主义者才有悲悯之情，一种拳拳的悲情。这种悲情成为中国人的一种民族文化的“基本动力”。正是有这个动力的推动，才使中国文化悠久辉煌，焕发出普照世界之光。

“乐感文化”则是李泽厚先生于1985年春在一次题为《中国的智慧》讲演中提出的，收录在《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这一概念早在1980年的《孔子再评价》中便已形成了。李泽厚先生认为，就民族而言，“乐感文化”是一种文化心理结构，是全民族性的，它是汉民族的一种无意识的集体原型现象，简称为全民族的集体无意识。

“乐感文化”是一种“实践理性”（或实用理性）文化。“实用理性引导人们对人生和世界持肯定和执着态度，为生命和生活而积极活动，并在这种活动中保持人际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既不使情感越出人际界限而狂暴倾泻，在消灭欲望的痛苦折磨中追求灵魂的超升，也不使理智越出经验界限而自由翱翔，于抽象思辨的概念体系中探索无限的奥秘，而只求在现实的世俗生活中取得精神的平宁和幸福，即在人世快乐中求得超越，在此生有限中去得到无限，这种极端重视感性心理和自然生命的人生观念和生活信仰，是知与行统一、体与用不二、灵与肉融合的审美境界，表现出中国文化是一种不同于西方的乐感文化。”

“乐感文化”积淀在柳宗元的生命中和生活中则不再是一种文化，而是一种具有心理结构特征的“意识”了。柳宗元在《愚溪诗序》里说自己被贬谪永州是“以愚触罪”，所以把冉溪改为愚溪。柳宗元用他的大量诗文，真实地记述了一个在专制皇权下“欲采萍花不自由”的蓄臣故事。在这个故事里，既是理想主义的，又是实践理性的。

“感时忧国”是历代忧患者的总体思想特征。孟子说的“君子有终身之忧”其实就是这种“忧”。

人们说柳子是这个家那个家，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主要是儒家。他说道、儒、墨、申、商、刑名、纵横之说，互相訾毁，这是不正常的，只要“皆有以佐世”，各家应“通而同之”。接着他说：“要之与孔子同道，皆有以会其趣。”^①“忧患意识”在儒家思想体系中，最具特色的，恐怕是居安思危的一种理性精神。柳宗元深知中唐时局，虽然一时尚在居安中，但他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得而不忘丧。这些危亡丧乱，便是“忧患”，而能“不忘”，便是“意识”。从他踏上谪永途中起，这种忧患意识，便如影随行了。

三

公元805年秋天，柳宗元到永州。潇湘秋景并未给他带来清爽的心情。悲秋之象，哀怨之音，是他踏入永州的第一感觉。永州，在柳宗元笔下多称为“蛮夷”之地，瘴疫潜行，湿气蒸郁，人烟稀少。柳宗元是乘船溯湘江来到这里的。他在人生辉煌时被贬，一住就是十年，日子过得孤寂而苍凉。

就个人的生命体验而言，孤独是忧患意识的一种表现。作为一个封建时代的中国文人，功名是他人生价值的标杆。他在年纪轻轻时便实现了自己的理想。20岁中进士，31岁晋升监察御史里行，33岁成为卓励风发的革新斗士，被提拔为礼部员外郎，遂成为中唐王朝政治核心的一员干将。短暂而烦嚣的“永贞革新”失败了，几乎是一刹那间，他被抛弃到远离政治漩涡的夷獠之乡。“窜逐宦湘浦，摇心剧悬旌。始惊陷世议，终欲逃天刑。”亲族朋友欲避之惟恐不及，地方官员视他如囚徒时时监视，已使他加倍孤独；永州司马员外置同正员之职，是一种闲职，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如同“与囚徒为朋”，使他更加失落；他蜗居在龙兴

^① 《柳宗元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第207页

寺，四年之中四次火灾，又使他惊魂不定；王叔文被赐死，“八司马”之一的凌准病死在连州，其余同道音书稀绝，母亲和亲人相继去世，疾病灾难几乎使他丧魂落魄……

悲剧关涉到人类生活中的恐怖。在那个庞大而可怕的体制中，他偏偏认死理，以为唯自己可以改变现状，创造奇迹，而这个体制却把他抛弃到了永州。除了一付微弱单薄的肉身，就单单剩下屈原式的精神的东西了。这美好的东西能有安放的地方吗？“为向经世心，古人谁尽了？”（《独觉》）想到这些，柳宗元难道不恐怖吗？

柳宗元一面瞧着皇帝的脸色，一面计量着自己的前程，一面舔舐着自己心灵的创伤，一面磨砺着自己的意志，终于在永州度过了悲剧性的十年。这是柳宗元人生淬火的十年，是他精神醇化升华的十年，也是他作为思想家、文学家创作最辉煌的十年。

灾难给了他思想与生命的转机。永州山水和人民则是这种转机的真正动力。当朝廷两次大赦都将“八司马”列入“不在量移”的名单中时，他对自己“守望者”角色感到了怀疑，由怀疑而寄托于笔底的深沉和峭拔。

像其他儒者一样，柳宗元思想意识中的忧是一种内在的忧，由实现理想而生起的忧，亦即善性力图扩充之忧。一种思救民于水火、挽大厦于将倾之忧。公元810年，柳宗元从东山法华寺来到了愚溪南岸定居，“甘终为永州民”。这里，“门存野田吏，慰我飘零魂”；这里，“鸡鸣村巷白，夜色归暮田”；这里，“篱落隔烟火，农谈四邻夕”。人民的苦难耳闻目睹，国家的命运忧心如焚，山水的滋润心凝神释。是永州造就了柳宗元在中国思想史、文学史上的地位。这种地位是以其承接屈原对社会的批判精神，“利民”的人道精神和知识者的气节、操守相融合而奠定起来的。

四

在儒家看来，人的外感的忧，忧的是物质上的“贫”，而内在的忧，忧的是如何获得追求的“道”。放逐者解脱精神痛苦的最好良药也正是“道”。柳宗元的思想越往深里想，越感觉孤独者的欣慰。屈原写《天问》，他写《天对》，回答了千余年无人敢回答的问题。并以《天说》《贞符》《天爵论》《六逆论》等思辩性著作，标举了“天人相分”的命题。

他写《封建论》，写《非国语》，写《送薛存义序》，述春秋之大义，发救时之高论，“吏为民役”，“民为君本”，“抑制豪强”，“厚德简刑”，“用贤弃愚”……

柳宗元是精神大餐的高级烹调手。庄子言天曰自然，他取之；荀子言天人相分，他取之；王充、范缜的元气一元论，他取之；佛教天台宗湛然及其弟子重巽“应知万法是真如，由不变故；真如是万法，由随缘故”，他取之……如此，他杂取各家，自成积极用世之哲学观和佛学观。

他说“位庸庇民，仁克莅之；紂淫以害，师殛圮之”（《天对》）。就是说王位是用来保护人民的，商汤能施行仁教而保持王位，纣王荒淫无道，所以被推翻杀死。

他说封建，“非圣人之意也，势也”。（《封建论》）阐发“势”的社会发展观，分析了早期产生封建制的原因和过程，论述了郡县制的优越。苏轼赞之为“宗元之论出，而诸子之论废矣。”（苏轼《论封建》）

他说“能顺木之天，以致其性焉尔”。（《种树郭橐驼传》）以植树喻育人，阐发了循序渐进、因势利导的教育观。尽管柳宗元“避师名”，然而“衡湘以南为进士者，皆以子厚为师。其经承口讲指画为文词者，悉有法度可观”（韩愈《柳子厚墓志铭》）。

从得知被贬江南的一刻起，他就把自己的命运与屈原的命运

联系在一起了。朔风中，飘泊的孤舟停靠在汨罗江。《吊屈原文》吐露了崇屈的心声：“先生之不从世兮，惟道是就。”“穷与达固不渝兮，夫唯服道以守义。”“退自服以默默兮，曰吾言之不行。既媮风之不可去兮，怀先生之可忘！”

这样沉重警策的诗句标识出一个沉重的话题。柳宗元从屈原的美政血脉中，寻找到了精神支柱：“唯以中正信义为志，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

值得指出的是，柳子被谪之初何以登蘋州望香零山，原因就在于香零山有潇湘庙。柳借屈原《离骚》《远游》湘灵鼓瑟之典抒发“信美非所安，羈心屡逡巡”之情。

在放逐之地永州，他的确“勤勤勉励”，会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集百家之思，拓宇楚辞，沉潜博见于诗于文，均取得了巨大成就。

他倡导“文以明道”的古文革新运动，并提出为文应“以神志为主”的主张。柳宗元的这种革新是从反省开始的。他问自己，我有何罪？不就罪在“服道以守义”吗！初到永州，白天阴风呼啸，夜晚寒雨绵绵，他写下了那篇有名的反讽文章《惩咎赋》，是反省，也是对自己无罪获谴的愤懑和对世事不公的抗议。永州之野捕蛇者的一席话震撼了他的灵魂。孔子说“苛政猛于虎”，他从蒋氏身上发现了赋敛毒于蛇。

在细心追寻“道”的生命旅途中，柳宗元从“无明”、“恐惧”渐渐走向精神的“豁明”。

五

值得一提的是，《柳宗元思想新探》处处贯穿着的忧、乐、“自我”（中间存在物）三分法，也许是一个创见。正如庞朴先生所说：“值得庆幸的是，近年来，随着人类认识的又一步深入，以及随着西方中心主义的式微，二分法颇呈春去也之势。多元法

正在崛起。儒家的三分法（执两用中），佛学的一心三观，慢慢被回忆起并被相信为更能提供给人以复杂世界的近似画面。波普尔的‘世界3’理论的出现，应该并非偶然。”^①“中庸”与“中道”的出现表明，所谓三分法，即在承认两极是真实的同时，更指出由于两极的互动，在两极之间，必有一种或多种兼具两极性质和色调的中间实在。

在柳子的思想里，有“圣人”与“小人”两极，同时存在既非圣人，也非小人的守望者“自我”；有忧者与乐者的两极，也同时存在一个即忧即乐、非忧非乐的“欲采萍花”者的“自我”；有有常与无常的两极，同时存在一个即有常即无常、非有常非无常的“超师”式的“自我”，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就实践理性而言，柳子思想中的乐感意识则是“仰不愧于天，俯不忤于人”之乐，一种实实在在的感觉。他在文学的创作中展现的一个贯穿始终的“自我”形象，是一个“万物皆备于我”的形象，也就是悟到了与道合一、与天地同体的超越之乐的形象。这种化忧为乐的体悟，便是新儒家们孜孜以求的“孔颜乐处”。这不是小人之乐。小人乐得其欲，而君子乐得其道。柳子的乐是理性的快乐。比如，在他的散文里，常常透出审美的人生快乐。他“牢笼百态”，创造了辞简义富、画面奇丽的山水游记。登西山，“尺寸千里”，“外与天际，四望如一”，他实现了“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之精神超越；观钴鉭潭，“乐居夷而忘故土”，一个“乐”字从反面托出一颗哀怨之心；游小石潭，“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怡然不动”。他把永州水之清写得出神入化。……永州九记，篇篇都是这样峭拔简洁，韵味隽然的精品。

又比如，在诗歌里，则看出诗人即忧即乐、化忧为乐的体悟。宋代诗坛高人苏东坡读柳子诗，亦感到自愧不如：“发纤秣

^① 《庞朴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版，第67页

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非余子所及也。”柳诗魅力，来之简淡，他借永州山水发其天怀，怨尤愤怒不形于词（《零陵春望》）：

平野春草绿，晓莺啼远林。日晴潇湘渚，云断岫嵒岑。
仙驾不可望，世途非所任。凝情空景慕，万里苍梧阴。

尤其是被誉为“妙绝古今”的五言诗：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这是一首“千万孤独”的题头诗吗？这是偶尔巧合还是有意经营？这已无关紧要了。这首诗是他期盼复用心态的全部。它的确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伟大孤独者的“自我”形象，感受到了他的高自期许，不随俗流的崇高人格！正如骆正军先生所说，此诗把佛学“有就是无、无就是有”和“空就是色、色就是空”的禅理，巧妙表达出来了。在“有”与“无”、“色”与“空”的两分之外，挺立着一个既不是“有”，也不是“无”；既不是“色”也不是“空”的“独钓”者，这就是柳子生命哲学中的“自我”！

那首《南涧中题》，如秋水无尘，如幽谷鸣禽，去国怀人之思何其清劲纾徐；那首《与崔策登西山》，深得骚学之旨，幽怨纤秣，颇有回肠荡气之美。

由此可见，柳子的“自我”，才是真正的“中间存在物”，一个哲学意义的“真我”。他在儒家境界里，是一个得道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忧者，又是一个“仁者不忧”的得乐之人；他在道家境界里，是一个已经“识尽愁滋味”者，但他并不是一个看透了忧愁本身，早就绝望了的“饱学无忧”之道学家……

这，也许就是柳子思想中的忧乐何以圆融之因。

2006年11月3日于永州拙斋

探索柳学的心路历程（代序）

蔡自新

学术是一种理解。学术研究是读书人的艰辛劳作。

1 000 多年前曾经在永州生活过 10 年的柳子可能没有想到，自己的这段经历，在身后会成为一轮又一轮学人的研究对象。

记得还是上小学的时候，语文老师给我们讲解《江雪》这首诗：“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他说，这是古代的一位文学家写的诗，这位文学家当时生活在永州，写的就是永州的雪景。哦，是永州么！然而，少时的我脑海里所展现的雪景，则是另外一幅图像。小时候，我家住在永州古城小西门外一座印子屋里。所谓印子屋，就是大门的门框用四块巨大的青色条石构建，整齐威严而非常有气派。这房子是过去一个大户人家的私宅，解放后成了公产，前半部分给了居委会，后半部分租给了两户人家。印子屋依傍古城墙临河而建，东靠城墙，大门外是一条石板古街；进入大门，通过幽深的堂屋就可到达西临潇水的吊脚楼。我的家就在挨着吊脚楼的风雨廊下，这吊脚楼也成了我童年看世界的窗口。下雪了！人们都说，正在下雪的时候和融雪的时候最冷，小孩子是体会不出这种细微的差别来的，只不过一年到头难得见到下雪，遇到下雪也就成了我们发疯玩雪的机会。在前面的石板街玩够了堆雪人、打雪仗，就想要从后面吊脚楼下到沙滩上去撒野。因为，除了发洪水之外，潇水河

畔的沙滩一年四季都是银白银白的一片，而紧挨着沙滩的则是常年都有停靠的棕黄相间的杉木排，为住在岸上城里的人们提供挑水、洗菜、浣衣的跷板，从木排上剥下来的杉树皮壳更是上好的薪柴。所以，潇水河的沙滩，常年一天到晚都是热热闹闹的。下雪了则不是这样。从吊脚楼往外望去，只见白茫茫的一片。原先的沙滩虽说是银白，但可能是含泥的缘故，毕竟有点白里泛黄。现在除了河里飘着的那条黛青色的水带，沙滩、木排和对岸的树、房屋都在皑皑白雪的笼罩之下，那一分白真有些白得泛亮，四周也格外安静。我也不敢邀人下去，只好呆在吊脚楼上看雪景。终于，看到有一位勇敢者穿着高筒子套鞋，雄赳赳地跨越已被白雪覆盖的沙滩，到木排上挑回一担水。也许他不想走重复路，没有顺着来时的路往回走（其实原来人们在沙滩上踏出来的路早已被厚厚的白雪抹得无影无踪），正当他吃力地担水走着，突然一脚踏空，人摔在雪地上了。“哦喝，中了我们的埋伏了！”几个玩伴都高兴得拍手叫好。原来，前些日子他们在沙滩上掏了些个坑，拣些杉树皮壳和树枝虚掩在上，捧上沙子盖平，为的是让过路人来运气了陷上一脚，出个不大不小的洋相。可是，今天这个玩笑开得大了，让这位下雪天到河里挑水的人不仅泼了一担水，而且湿了一身衣，只见他被冷得边抖边骂地担着空桶飞跑了回去。不知怎的，我的心也顿时咯噔一下，让恶作剧的高兴劲融入丝丝寒意。这是我对江雪的最初情结，虽然我那时并不真正知道柳子与永州的关系。

我正儿八经地将柳子研究作为一项工作，是在先师龙震球、何书置两位的带领下入途的。那是1981年夏天，我从就读的湖南师院零陵分院中文科毕业被安排留校工作。一开学，就遇上了学校更名为零陵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所做的第一项工作是陪同龙震球、何书置两位老师去长沙，到省图书馆、湖南师院图书馆等去查阅有关柳子的资料，为在永州首次举办全国柳宗元学术讨论会作准备。文革期间，永州的书籍资料损失很大，只有到省城去

求援。在那样一个酷热的秋天，我陪两位老师白天挤公共汽车，到图书馆找书借书看书，当天没看完的借出来晚上带回长岛饭店誊抄。当时既没有复印机，也没有空调，甚至连电风扇都是稀罕之物，我们师生三人在长沙夜以继日地忙了几近半个月，终于有了不少收获。例如，那份注明了东山和西山的位置、清代年间撰修的《永州府志》所绘的“城厢图”，就是我照着书本临摹回来的，成为向与会国内学者推介永州历史沿革的重要资料。尤为使我钦敬的是，我的两位老师的执着探求精神，激发了我对曾经生活在永州的柳子产生强烈的兴趣，并且准备将柳学作为自己事业的发展方向。遗憾的是，不久后因我的工作变动而离开了学校，以至这种追求没有持续下来。

我真正将柳学作为研究对象，则是前些年追随杜方智老师的脚步而行的事情。2000年的秋冬之交，我和吕国康、翟满桂、蒋晓丽、骆正军等人随杜方智老师，应广西柳州市柳宗元学术研究会谢汉强会长的邀请，循柳子旧时行踪，做了一回从永州到柳州的访客。公元805年，柳子因参与王叔文集团政治革新失败而遭流贬，待罪南荒成为永州司马，一滞十年。直到815年，他奉诏赴都，在长安停留不到一个月，再次远贬为柳州刺史，四年后病逝于任上。可以说，永州与柳州，是柳子分别彰显思想、文学、政绩的地方。我们的这次柳州之行，则为柳州人弘扬柳文化的精神所震撼。邀请我们去柳州的谢汉强先生，不仅是柳州市柳宗元学术研究会的会长，还担任着中国柳宗元研究会的副会长。当时中国柳宗元研究会会长是著名学者吴文治先生，研究会的秘书处设在柳州，柳子的老家山西永济也有人参加和承办学术研究活动。由于柳子生涯的最后四年与柳州有缘，柳州人十分恭敬地把柳子奉为地域文化象征。这里不仅有柳侯祠、柳宗元衣冠冢等文物遗迹，市政府还每年拨出专款，组织开展柳学研究。谢汉强先生以前做过柳州日报社的副总编辑，是弘扬柳学的热心人。在他的策划下，积极鼓动柳州打好柳文化的品牌，《柳州日报》辟